

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印象 与内核及其成因^{*}

□唐贤秋

〔摘要〕 广西桂林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洲村被誉为“百年清官村”。该村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百多位出仕为官者群体,而且人人都为官清廉。“百年清官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核,即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子人格追求、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与耻感文化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其文化之所以形成,得益于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巨大成效以及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41-06

On the Cultural Impression, Essence, and Origins of the "Centennial Village of Upright Officials" in Guangxi

TANG Xian-qiu, TANG Jiang-yun-lu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Jiangtouzhou Village in Jiuwu Town of Lingchuan County of Guilin Guangxi is well-known as the "centennial village of upright official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ver 100 officials came out of the village and all of them kept uncorrupted and honest in their terms of office. The profound cultural essences of the "centennial village of upright officials" include the gentlemen's pursuit of dignity implied in the lotus-loving culture, the orientation of learning to success guid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ulture, and the clear concepts of honor and disgrace proclaimed by the shame-based culture. The forming of this culture results from the southward dissemin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its profound impacts in Guangxi, the great effects caused by the morality-priority family education mode and the upright official cultures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Guangxi; the "centennial village of upright officials"; culture

一、引言

广西“百年清官村”,是指广西桂林灵川九屋镇的江头洲村。

该村不仅完好地保存着明清之际的古建筑群,而且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一百多位通过科举之路而出仕为官者群体,而且个个都能做到为政清廉,无一人有贪腐的劣迹。2002年7月23日,《新

华每日电讯》推出一篇文章《桂林发现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着重介绍了桂林江头洲村古建筑群,并认为江头洲村在广西现存的古村落中“知名人士第一”“历史文化遗迹第一”和“‘五代知县’第一”。2003年12月26日,《中国商报》刊发文章“桂林有个‘清官村’”,首次提出“江头洲:清官村”这一概念。

此后,桂林日报、广西日报、新华网广西频道等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之现代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0FZZ002)。

媒体刊文,正式提出“江头洲村:百年清官村”。继之,《广西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广西地方志》与《炎黄世界》等国内多家报刊也纷纷登载文章,不仅对“百年清官村”进行“探秘”,而且对其与爱莲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

那么,“百年清官村”作为一种个案,其背后是否体现着一种文化凝结?这种文化内核是什么?它又何以能够形成?带着这些问题,本课题组于2013年1月,前往桂林灵川江头洲进行了实地考察,形成了关于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大致认识。

二、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印象

江头洲村距桂林市区三十多公里,现有一百八十多户人家,90%以上居民为周姓。据资料记载,该村周姓居民乃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后裔于明朝洪武年间从湖南道州迁移至此定居建村繁衍而成,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江头洲是一个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古村落。它不仅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而且建筑设计匠心独运,处处透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江头洲村古建筑群布局规整,规模宏大,至今保存的明清建筑一百三十余座,六百余间;每座建筑院落青砖灰瓦,木质构架,镌刻雕花,古朴典雅。处于古建筑群核心地位的周氏宗族祠堂——“爱莲祠”,将传统儒家文化与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祠堂从外至内,门柱上分别悬挂着“世德乡举选,宗盟会法传”“宗传姬旦家声远,学绍濂溪道脉长”“学以精微通广大,家缘清俭促平安”等楹联。其中,“世德”,出自《诗·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是说周武王以德配天,天下归之,其德行与先辈相承。此处“世德”是指先辈累世功德。“宗盟”,指周姓宗族;“会法”,本来指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审案,此处特指公正为官。“姬旦”,指周公旦,他因提出“敬德保民”并制礼作乐开创周邦伟业而深受孔子等儒家代表推崇。“濂溪”,指濂溪学派创始人、被称为濂溪先生的周敦颐。这些楹联的大意是,从周公旦到周敦颐,周氏累世承袭了精微为学、勤俭持家、公正为官等“修齐治平”的传统美德,周氏后世应将此传统发扬光大。为了弘扬先世美德,周氏祠堂正厅悬挂着周敦颐画像并镌刻着周敦颐《爱莲说》全文,同时张贴着《周氏家训》。其中有“规行矩步,奉莲指教”“祛邪传儒,立身厚道”“衣食俭朴”“增知博学”“出仕为官,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等训词,涵盖了对周氏族裔子弟立身处世、求学持家、为人为官等方面的要求。祠堂两厢,分别用木樨制成“慎言”“敏事”“循理”“遏制”等训词,并镶嵌于窗格之

中,让周氏后人于润物细无声中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将传统文化中的箴言与建筑设计融为一体的巧妙构思,体现出一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美结合”。^[1]

村中保存着古巷、古井、古牌匾、古牌坊、古石刻碑与古桥等古迹。其中,井口方形而井内壁呈圆形的古石井特别引人注目,方形井口倒映在圆形水面,犹如一枚铜钱,喻示着为人千万别贪,否则便会“掉到钱眼里就捞不上来”。^[2]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将道德教育寓于生活之中,时刻教育着后世子孙为人当以廉洁为本。由古石板铺就的古巷,分别标有“秀才巷”“举人路”“进士街”等;许多民居门楼分别悬挂着“进士”“解元”“太史第”“荣禄大夫”“通奉大夫”“按察使”“布政使”“四代翰林”“五代知县”等牌匾,一些居民家中还保存着官职文案、古陶瓷、古雕版、古镬床等文物。这一切似乎在向当代人们展示着江头洲村周氏家族在封建科举时代通过“学而优则仕”之途所曾经取得的辉煌。事实上的确如此。据资料记载,该村仅在明清时期,便出现了一百多位通过科举之路而出仕为官者群体。其中,进士8人、举人31人、秀才200多人,甚至出现了“父子进士”“四代举人”等科举奇迹。特别是,该村出仕为官者群体当中,都能做到两袖清风、为政清廉,无一人有贪腐的劣迹。江头洲村也因此享有“中国科举仕宦第一村”“才子村”和“百年清官村”之誉。2005年以来,该村先后获得“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村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魅力景区”与“中国传统古村落名录”等称号。

江头洲村能获得如此诸多殊荣,乃得益于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即“百年清官村”所积淀的文化现象。我们都清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是一个腐败的大染缸。然而,在江头洲村,古代出仕为官者当中却都能在那种环境中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从而保持为政清廉的品格!江头洲村出现的为官清廉者人数并非一两个,而是一个群体!这一为官清廉者群体前后延续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这种现象不仅在岭南地区,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以至有人这样评价说:“现存的江头洲古村落就是一部历史书、文化史,一部建筑史、艺术史,一部官制史、廉政史,一部教育史、科举史。”^[3]这种评价并不过分,因为,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三、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内核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4](P2)}它

是一种以技术体系为表征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和行为体系等方面的总和。广西“百年清官村”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凝聚,其文化内涵不仅通过器用层面的技术体系(即物化形式的古建筑群)表征出来,而且以其富有精神内核的价值体系而焕发出永恒弥久的价值魅力。这种富有魅力的文化内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子人格追求,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耻感文化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

(一)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子人格追求

在江头洲村,一股浓郁的爱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周氏宗族祠堂被称为“爱莲祠”;祠堂正厅被称为“爱莲堂”,不仅悬挂着周敦颐画像,而且镌刻着周敦颐的《爱莲说》全文;村中古巷的路面是用鹅卵石镶出的一朵朵莲花;村中古建筑中的门楼、格扇、窗棂、雀替、神龛、柱脚等饰刻的各种镂空花以莲花居多;村中还建有爱莲池,每当莲花盛开,清香弥漫全村。村中居民在“乐赏莲花的同时,性情上也受到莲花的陶冶”。^[2]

江头洲村之所以如此推崇爱莲文化,是因为他们在传承着祖先周敦颐的君子人格追求。周敦颐所著《爱莲说》,因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以表达自己的君子人格志向而成为传世经典。莲花与菊花、牡丹等,本是大自然中的植物,周敦颐之所以独爱莲,是因为莲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等品质。就是说,莲花处浊境中能洁身自爱、自身清白而不炫耀、内心坦荡、正直无私、不攀爬富贵、不卑躬屈节等。莲花的这些高贵品质,恰好契合了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德。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看来,君子之为君子,在于君子具有“见得思义”“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敦善行而不怠”等品德,君子的这些品德与莲花的品质高度耦合。故此,莲花被奉为“花之君子”而为周敦颐所独爱。加之“莲”通“廉”,周敦颐不满于社会贪浊的现实而“将人品中的‘廉’与自然中的‘莲’有机结合起来”,^[5]寓“廉”于“莲”,寓“爱廉”于“爱莲”,^[6]充分表达了周敦颐致力于追求清正廉洁的君子人格的志向。事实上,周敦颐在人为官中也始终表现出一个儒家君子的风范,人品高洁,步入政坛后始终坚持勤政为民、廉洁从政,努力实践着“君子之政”。^[7]周敦颐因对君子人格追求的知行合一而赢得社会世代的尊重,也赢得其族人后裔的敬仰,这正是作为周敦颐后裔的江头洲村古居民推崇爱莲文化的内在原因。周氏宗族祠堂大厅张贴的《周氏家训》明确规定了“规行矩步,奉莲指教”的训词,由此凸显出江头洲村居民致力于君子人

格追求的文化意义。

(二)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

隋代以降至明清沿用的封建科举取士制度,促进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向现实的转化,也使得那些出身卑微但却有真才实学的普通寒门学子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而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登科及第的学子所焕发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的荣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各地学子发奋读书以求取功名的积极性。这种由于科举取士而形成的文化,导引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成才取向,并为许多知识分子打开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门。

封建科举文化所产生的这种价值导向,不仅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坚定着“读可荣身”的强大信念,而且促使许多普通家庭将送子读书作为“家风”“家训”而坚持下来。古代江头洲村就是如此,这里的周姓居民承袭着祖先周敦颐“博学力行”的传统,坚持以“送子求学,增知博学”作为家训而传承下来。这种“送子求学”的家风家训,使得江头洲村周姓居民在封建科举文化中如鱼得水、风光不断。据《灵川县志》记载,仅在清代,江头洲村便出现了周启运、周冠、周廷揆、周绍刘、周绍昌等5名进士(其中翰林院4名),中举者17人,副举人2人,秀才60余人,职官有代理总督、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知县等。^{[8](P856)}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父子庶吉士”(父周履泰和子周启运)、“父子进士”(父周启运和子周廷揆)、“父子翰林”(父周冠和子周绍昌)等奇迹。仅周履泰一家,便创造了“一门两进士,三代四举人”的奇迹,在乡里传为美谈。漫步在江头洲村,便会感受到一股浓郁的科举文化气息。村中古建筑群里的“秀才巷”“举人路”与“进士街”等古巷,以及每家居民门楼前悬挂的“进士”“解元”“太史第”“荣禄大夫”“通奉大夫”“按察使”与“布政使”等牌匾,见证着封建科举文化给古江头洲村周姓家族带来门庭荣耀的历史事实。

(三)耻感文化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

耻感文化是一种为了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而突出人的羞耻心与耻辱感所形成的知耻求荣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总和。它因为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而向内要求人们“行己有耻”,具有知耻观念,崇尚操守与褒扬气节;它又因为作用于人的行为模式而向外要求人们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求荣避辱。^[9]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耻感意识,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耻感文化。管子非常重视耻感意识,并将其置于关乎国家兴亡的纲领性地位。他

说: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①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②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感,从不知羞耻到知道羞耻,则可以免于羞耻。在孟子看来,“无羞恶之心,非人也”。^③因而主张人人都应该有一种“羞恶之心”,做到“闻过则喜”。周敦颐继承了孟子的耻感思想,并认为,“闻过”是人生之幸,“不闻过”则是人生之不幸,“无耻”乃是人生之大不幸。他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④朱熹对此解释说:“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⑤朱熹认为,士人要能识廉退之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⑥传统耻感文化因力倡“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而深入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内心之中并体现在各个群体的行为之中,它甚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成为“挺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在民族危难时刻,“勿忘国耻”往往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9]

以“秉承祖旨”为家训的江头洲村居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耻感文化。《周氏家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耻感”一词,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明确的耻感意识:如“衣食俭朴,不倡奢耗”“出仕为官,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等训词,便内含了明确的知耻求荣观念:以衣食俭朴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以任官清廉为荣、以贪浊图私为耻;以报国务民为荣、以贪图享乐及侵渔百姓为耻。江头洲村周姓子弟也正是这样践行的。他们出仕为官,能够坚持忠于职守、廉洁从政,勤政为民。据民国十八年《灵川县志》记载,乾隆年间举人周履泰,历任昭平知县,爱民育士,恤狱慎刑,举办义学,年老告归时,士民泣送载道。^{[10](P632)}乾隆年间举人周履谦(周履泰之弟),在四川梁山等地任职,他廉政爱民,以“贪一文绝子灭孙,冤百姓男盗女娼”自勉,成为遐迩闻名的“廉官”。道光年间进士、翰林出身的周启运(周履泰之子),任职期间,“兴农事,除水患,重教化,修义学,捐薪俸,救良民”,被林则徐称赞为“循良第一”。^{[10](P637)}道光年间举人周启稷,为官勤勉,体察民情,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吏畏民怀,被百姓誉为“清官”。周启运之子周廷揆,中进士后主事布政使,他“正躬率属,洁己爱民”“守正不阿”。光绪年间进士周绍刘,在浙江富阳任知县,遇富春江山洪暴发,亲自划船营救百姓,他生活简朴,一身清正,严惩贪贿,受到当地百姓称赞。咸丰年间进士周冠,为官清廉,廓清积弊,抑豪强,通民情,铁面无私,除暴安良,被百姓誉为“周青天”。^[11]周冠之子周瑞琦,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因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成为学生领袖。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受到北洋政府的追捕,他毅然写下绝命书后投海

自杀以报国。其绝命书曰:“山东为我国孔圣发祥之地,青岛丧失,国脉不足培矣,我生不辰,邦国交瘁,难日至矣。焉用身敬告同学须努力,同心以雪耻,毋遗羞于五分钟热度。”^{[10](P652)}其报国情怀深受后人景仰。江头洲村出仕为官者群体的这些荣耀,无疑是耻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生动凝结。

四、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成因

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不仅得益于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且是江头洲村周姓子弟恪守祖训实行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的结果,同时,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无疑也对江头洲村出仕为官者群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灵川江头洲村周姓居民为理学始祖周敦颐后裔南迁至此繁衍而成。《灵川县志》记载:“周氏系出濂溪德盛者,泽弥长宜发之,伟乎!”^{[8](P856)}《周氏族谱》也记载:周敦颐第14代后裔周秀旺公于明初从湖南道州宦游南下进入广西,于江头洲建村定居。江头洲村遗留下来的周氏家族碑志印证了这一点:“始祖公乃濂溪公之裔也。因宦游而卜居于灵岩江头洲。”^[12]那么,周敦颐后裔为何南迁至此?

我们都清楚,广西桂林在先秦时期为南蛮之地,属于楚地。自秦代开通灵渠之后,中原文化经灵渠纷纷涌入广西,并与岭南文化相互交融;中原先民也屡屡大举南迁,至唐宋之交,南迁者形成一定的规模。^{[13](P76)}两宋时期,理学盛行。兴盛于宋代的书院文化也进入广西。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因其父亲周辅成曾担任广西桂岭(今广西贺州桂岭镇)县令而在广西桂岭度过其早年生活。^[14]其晚年又在岭南做官,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期间,周敦颐曾“游西粤”,经由桂林,到漓江书院“给地方学子传道授业”。^[15]后经梧州入浔阳至龚州(今广西平南)、桂平,接受时任龚州知州程珣之邀,为程珣之子程颐、程颢授业于广西桂平。^[12]这些无不为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宋室南渡之后,广西成为南宋的大后方”,桂林成为广西的文化教育中心,许多理学传人包括“程颐、程颢的族裔多有为官或避地桂

① 《管子·牧民》。
② 《孟子·尽心上》。
③ 《孟子·公孙丑上》。
④ 《通书·幸第八》。
⑤ 《朱子语类》卷九四。
⑥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林者”。^[12]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广西的传播。

理学在广西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创办书院和重视教育。从南宋开始，“因官职之需或南迁入桂的理学大师、门人及其追随弟子不在少数”。^[16]他们在广西办书院、建学宫、设义学。通过“每岁科试录取诸生”，教授“四书”“五经”，传授理学思想。于是，读圣贤书，应科举试，在广西学子中蔚然成风，许多广西学子在科举考试及第后出人头地，光耀门庭。据资料记载，仅灵川县，自宋代开始至清末便有 51 人考中进士。^{[8](P747-748)}

灵川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桂走廊南端，扼中原文化进入桂林的北大门，自古为“楚越往来之要冲”“领中原风气之先”。理学入桂之后，书院文化便在灵川得到了蓬勃发展。仅在清代，灵川创建的书院就有文笔书院、培英书院和博约书院等。^{[8](P746)}灵川江头洲村距桂林仅三十余公里，它位于漓江支流甘棠江上游的护龙河西畔，四周被群山环抱，中间是万顷良田，透澈的河水从村前蜿蜒而过，村后苍松翠柏，古树参天，景色宜人；加之当地民风朴实，境内居民“禀性多朴实……不健讼，不苟偷，重廉耻，轻浅薄”，^{[8](P868)}是一个宜居耕读的好地方，这也是周敦颐后裔宦游至此建村定居的原因所在。江头洲村周姓居民非常重视教育。如“九屋乡江头洲村举人，周廷冕为专科族中子弟而设的通政、中正、蒙正三学堂，以及进化、保粹两乡塾，均曾称著一时”。^{[8](P748)}他们继承先祖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精华，循理节欲，身体力行，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也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情操与精神追求。这是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形成的深刻背景。

(二) 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所取得的突出成效

江头洲村古居民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并始终将品德教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这是因为，品德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但丁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因此，良好的品德是儿童成长成才的关键，也是做人做官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就主张家庭教育应坚持德育优先的原则。如诸葛亮教子应“修身”“养德”“明志”。《朱子治家格言》中提出：“居身务求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围炉夜话》中也提到：“教子弟求显荣，不如教子弟立品行。”无不突出了品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优先地位。

理学先驱周敦颐也强调了这种品德教育的优先性，并提出要以圣人的德性来塑造理想人格。他说，希贤希圣，是士人应努力追求的人格目标，“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①。何为“圣”？周敦颐认为，圣人

就是要做到“诚”，即具有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品质。“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诚者，圣人之本。”^③如何做到“诚”？周敦颐认为，那就是要“修德”以“立人极”。即圣人“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与天地合其德”^④“圣德修而万民化”^⑤。这就为士人指明了通过“立诚”“修德”达到“成圣”之途。由于“教育是一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事业，必须先求己有所立、有所达，然后才能立人、达人”。^[17]因此，周敦颐在教育中，特别注意以身作则，并以“爱莲”咏志来表达自己的品格追求，这种重视人格感化和以德服人的德育方式，无疑会对后世产生着示范性影响。

江头洲村古居民便承袭了先祖德育优先的家庭教育模式。从江头洲村《周氏家训》中可以窥见一斑。一部《周氏家训》，可以说是教育子孙后代为人处世做官的一部极好的德育教材。其中不仅包括家庭教育的德育优先性原则，即“六德六行，从小诲教”“祛邪传儒，立身厚道”。而且包括这种家庭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即“规行矩步，奉廉指教”“伦理纲常，铭刻心中”，还包括这种家庭德育的终极目标，即“誓执功令，才称圣人”。德育内容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等。其中，家庭美德要求有：“崇尚祖德”“尊老爱幼”“孝侍双老”“侄叔相好”“妯娌互敬”“孝子贤孙”等；社会公德要求有：“仁慈隐恻，温恤关照”“悯困之人，挺身解救”“劳谦谨敕，勿听歪道”等；为官职业道德要求有：“出仕为官，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个人品德要求有：“贵谷务本，稼穡及重”“粮丰物阜，立根之首”“衣食俭朴，不倡奢耗”“做人刚健，不婢妄娇”“慎言置事，循理业兴”“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施惠勿念，受恩莫忘”等。《周氏家训》中还包括遵守各种道德要求的家庭族规，即“族规治家，施行笞罚”等。这种德育优先的家庭教育模式，应该是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三) 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固然因专制的存在而成为一个腐败的大染缸，但是，一些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也会对那些为政清廉者采取表彰和提拔重用等措施，以期塑造“清官”形象来树立官清吏廉的典型，从而促使广大官吏见贤思齐。这种清官文化对于引导封建社会广大居官从政者树立清廉

① 《通书·志学第十》。

② 《通书·诚下第二》。

③ 《通书·诚上第一》。

④ 《太极图说》。

⑤ 《通书·顺化第十一》。

之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因为廉洁为官、执法公正、生活简朴等品质而得到一些封建帝王的赏识和老百姓爱戴。如在宋代,北宋包拯为官清正廉洁,执法公正而受到尊重并被誉为“包青天”;在明代,方克勤为官清廉而深受百姓爱戴并被朱元璋“奖谕有加”。在清代,江苏长洲人张埏,为官因“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并坚持“永除私派”,做到“官清民乐”而被康熙“以卓异荐,擢广西南宁通判”。^①山西永宁人于成龙,曾任罗城知县,生活俭朴,因每日食粗粮、青菜而被江南人称为“于青菜”。于成龙为官清正廉洁、治理有方而被康熙帝赐予“清端”封号,并“命加成龙太子少保衔,以劝廉能”。因此,封建帝王通过对官吏进行廉洁从政的劝勉,通过对躬行清廉之臣的提拔重用等措施,树立了一种正面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一种官场正气。

应该说,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其祖先周敦颐不仅以“爱莲”立志,而且在为官生涯中践行着清廉正直与勤政爱民等品行。这些无不对江头洲村周氏后裔产生着深远影响,以“秉承祖旨,扬吾家风”为家训的江头洲村将“出仕为官,官清吏瘦”载入《周氏家训》之中,成为激励后人为官清廉的动力所在。

五、结语

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是广西历史文化资源中的一朵“奇葩”,也是广西廉政文化资源中的一张精美“名片”。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在封建社会的腐败大染缸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奇观而引发我们当代人的深思。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显著,但存在的问题却依然突出,始终有人在反腐倡廉的高压线上铤而走险!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乃是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不够,导致我们对廉荣贪耻的耻感文化氛围营造不够,进而导致一些共产党人对廉政人格锻造不够。而建设廉政文化,需要弘扬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于是,追溯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广西廉政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而且对于整个社会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当然,作为封建科举文化的产物,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糟粕,如强调读书为了做官的官本位思想、“任官存君”的忠君思想等,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批判与改造。总之,追溯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挖掘出其文化内核并进行合理

的扬弃,对于我们的共产党员从中吸取有价值的营养从而加强廉政人格修养及培养廉荣贪耻的荣辱观念,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启迪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阳引,梁政华.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美结合的典范:桂林江头洲村古建筑群[J]. 世界遗产论坛,2009,(2).
- [2] 秦兴旺,莫毅先.“百年清官村”探秘[J]. 炎黄世界,2012,(5).
- [3] 周其厚. 论桂林江头洲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 [4] 冯天瑜,杨华. 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 吴怪. 周敦颐“濂溪”之名考辨[J]. 南昌高专学报,2005,(5).
- [6] 陆魁宏. 周敦颐爱廉思想的当代价值[J]. 船山学刊,2010,(3).
- [7] 郑晓江.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J]. 武陵学刊,2010,(3).
- [8] 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灵川县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 [9] 胡凡.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内涵与意义[N]. 人民日报,2010-07-16.
- [10] 李繁滋. 灵川县志[M].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18年石印本.
- [11] 俞孝鹏. 百年清官村——灵川江头洲[N]. 新华网广西频道,2008-10-16.
- [12] 廖江. 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以江头洲村爱莲文化为例[J]. 广西地方志,2009,(2).
- [13] 胡大雷,何林夏. 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14] 潘茨宣. 周敦颐:出生在广西的世界文化名人[N]. 广西日报,2008-03-21.
- [15] 蒋忠民. 灵渠文化积淀二千年 桂林古灵渠畔漓江书院觅踪迹[N]. 广西日报,2005-04-14.
- [16] 卢晓玲,孙先英. 南宋广西书院的理学特质[J]. 柳州师专学报,2009,(1).
- [17] 王柏寿. 周敦颐教育思想之研究[J]. 台湾国民教育研究学报,2004,(13).

收稿日期 2013-06-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韦琼瑜】

【作者简介】唐贤秋(1965~),湖南东安人,博士,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伦理学学科带头人。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① 《清史稿·循吏一》。